

徽州历史档案与文化丛书

薪火相传

明清徽商的职业教育

王世华◎著
黄山市档案局(馆)编

益叔運仁ヨセ之帳ノヨシ手

瑞布

共泰宗の志工坊
八千五百十

元我黄拾、七帖
益毛洗の元帖
益毛其拾壹五帖
洪泰銀今八七帖
洪泰砂世七五帖
洪泰麻六八七帖
洪泰粉拾七帖
共泰宗の志工坊
八千五百十

共泰宗の志工坊
八千五百十

三
付又義正作是解
付又義正作是解
付又義正作是解
付又義正作是解
付又義正作是解
付又義正作是解
付又義正作是解
付又義正作是解
付又義正作是解
付又義正作是解

元茂砂文拾之川
益叔運仁ヨセ之帳ノヨシ手
益叔運仁ヨセ之帳ノヨシ手
益叔運仁ヨセ之帳ノヨシ手
益叔運仁ヨセ之帳ノヨシ手
益叔運仁ヨセ之帳ノヨシ手
益叔運仁ヨセ之帳ノヨシ手
益叔運仁ヨセ之帳ノヨシ手
益叔運仁ヨセ之帳ノヨシ手
益叔運仁ヨセ之帳ノヨシ手

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项目

徽州历史档案与文化丛书

薪火相传
明清徽商的职业教育

王世华○著
黄山市档案局(馆)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薪火相传：明清徽商的职业教育 / 王世华著；黄山市档案局（馆）编。—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12

（徽州历史档案与文化丛书）

ISBN 978-7-5699-2803-7

I. ①薪… II. ①王… ②黄… III. ①职业教育—教育史—研究—徽州地区—明清时代
IV. ①G71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2344 号

薪火相传：明清徽商的职业教育

Xinhuo Xiangchuan: Mingqing Huishang De Zhiye Jiaoyu

著 者 | 王世华

编 者 | 黄山市档案局（馆）

出 版 人 | 王训海

责任编辑 | 方 烝 王 雷

装帧设计 | 孙丽莉 段文辉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三河市嘉科万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0316-315677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31 字 数 | 385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2803-7

定 价 | 1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徽州历史档案与文化丛书
编委会

主 任 周天伟 陆 群

副主任 洪建春

成 员 田玉峰 孙梅森 汪 杨 尚修茂 胡排富

(按姓氏笔画排序)

徽州历史档案与文化丛书
编写组

主 编 王世华

编 委 马寅虎 方 烝 王 雷 刘道胜

陈安生 胡乃玉 胡中生 郑建新

洪 璟 翟屯建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党的十九大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化发展发表重要讲话，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升华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脉”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徽州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如何加强保护传承、使其在新时代舞台上再放异彩，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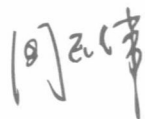
徽学与藏学、敦煌学并称为我国三大国际性显学。在黄山大地，处处可见徽州文化的烙印和风采，这里被誉为“东南邹鲁”“文物之海”“文献之乡”。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文物保护单位6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8000多处，博物馆50多家，馆藏文物15万余件，珍贵文物近7000件。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建筑技艺等14大类1300多个项目，种类和数量均居全省第一。与这些地面文物和非遗项目同样无法估价的，还有1000多种徽州宗谱族谱、3000多种徽州典籍文献和50多万件徽州民间契约文书。这些文献文书上至南宋、下至民国，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内容丰富、保存齐全、历时久远，反映了徽州近千年历史长河中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实践活动，堪

称徽州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徽州历史档案保护，在国家和省有关方面关心支持下，抢救和保护包括文献文书在内的古徽州历史档案3.5万余卷（件），其中“明代徽州土地产权变动和管理文书”入选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明代徽州江氏分家阉书”入选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次将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项目——徽州家族文化研究、钦泉记《商贾便览》研究、徽州茶商研究、徽州文书研究等4个档案文化课题成果，以“徽州历史档案与文化丛书”形式编辑出版，这是我市档案部门利用馆藏历史档案推动学术研究、服务文化建设的有益尝试，也是徽州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实践，对于深化徽学研究、弘扬徽州文化、更好地发挥以文化人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走进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我们应在发掘徽州文化时代价值上大胆探索、推陈出新，不断创造出符合新时代特征的文化产品，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期待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进来，全方位、立体化开展徽州历史档案保护与开发工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续写无愧于先贤、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后世的文化新篇，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更美丽更富裕更文明的现代化新黄山作出应有贡献！

是为序。



前 言

随着徽商研究的深入，人们很自然地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使得徽商能够延续六百年之久，能够创造三四百年的辉煌？应该说，这是徽商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1]有的地方经商人数更多，像歙县就有人指出：“予邑（歙县）编氓，贾居十九。”^[2]很多人家都是父业子继，形成一个个经商世家。

既然是父业子继，这就出现了二代、三代传承问题。新一代虽然继承了父辈的事业，但他们不仅没有父辈的经商经验，更没有父辈艰难创业的深切体会，如何能够继承父辈的精神，发扬光大父辈的事业，这是父辈徽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职业教育也就顺理成章地提上了日程。

何谓职业教育？根据《辞海》的解释，所谓职业教育，就是“给予学生从事某种生产劳动所需的知识技能的教育”。^[3]按照该辞典的说法，“职业教育”是近代才出现的概念，十八世纪末产生于欧洲，

[1]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一《赠程君五十叙》。万历五年王氏世经堂刊本。

[2] 歙县《虬川黄氏宗谱·云景黄翁六十寿序》。歙县《虬川黄氏宗谱》，清道光年间刊本。

[3] 《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1982年第二次印刷，第1817页。

十九世纪中叶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各国乃设立中等教育阶段的职业学校和职业补习学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外的职业教育有各种不同设施，有的设单科性的职业中学，有的在综合制中学内设职业科。中国职业教育体制确立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的《钦定学堂章程》，其后学制迭有变更，一般在中等教育阶段内设高、初两级职业学校。

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说法并没有错。作为一种明确的概念，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出现的，因为只有资本主义才产生大规模有组织的生产活动，当很多人都从事同一种工作时，职业教育也就应运而生。虽然在我国从职业教育体制上说，它的正式确立，是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的《钦定学堂章程》，但如从内涵上说，只要是给劳动者尤其是初学者进行“某种生产劳动所需的知识技能的教育”，就是职业教育，那么，这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

徽商有没有职业教育？答案是肯定的。尽管当时并没有职业教育的概念，但向后辈传授经商经验和技能，培养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塑造他们完美的人格，这些事情实际上父辈徽商都是在一代一代坚持实践的，一些职业教材也是这么要求的。而这一切实质上就是职业教育。

虽然此前学界还没有提出徽商职业教育的概念，但徽商的商业教育早有学者提出并研究了。李琳琦教授早在1998年就在《从谱牒和商业书看明清徽州的商业教育》^[1]中第一次论述了徽商的商业教育，文中提出了徽商的商业教育表现在：新的商业价值观的宣传；途程观念的形成与途程知识的普及；商业贸易具体运作过程中的实用知识与技能的传承；商业经营原则与商业道德伦理观的教育。该文还指出了徽商商业教育的

[1] 见《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秋之卷（总第21期）。

特色：其一是注重对传统商业价值观的改造；其二是商业教育内容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其三是商业教育方式的多样化。该文论述还是比较全面和深刻的。其后宗韵女士在《明清徽商家庭商业教育述略》^[1]一文中从家庭教育的角度将徽商的商业教育分成知识传授、素质培养、技能训练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张海英教授则从商书出发泛论商业知识的传授。她在《从明清商书看商业知识的传授》^[2]一文中认为，明清时期大量商书的刊行，反映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带来的社会经商、行商风气之盛，同时它本身也凸现了这一时期商人意识的觉醒和商人自身对这一职业的认可与重视，说明这一时期的商人，已开始重视商业知识的累积和传播，并对子弟、生徒授以职业的商贾教育。就明清商书中所体现的商业知识的传授特点而言，公开刊印的商书多以“行商”知识为主，主要介绍交通路线、各地商品行情、经营买卖各类商品的专业知识等内容。“坐贾”方面的商业书，因时常涉及店家内部的经营秘密或行业窍门，初以抄本为多，刊印本多出现在清后期。而一些涉及本行业技术秘密、针对性较强的商书，主要都是以抄本的形式在业内传授。该文虽然不是专论徽商，但无疑对徽商的研究颇有启迪。较为详细研究徽商商业教育的要数2016年南京师范大学的汪婷婷的硕士论文《明清徽商商业教育研究》^[3]，文中首先指出徽商商业教育的目的是：期望子弟成材；保障宗族繁荣；应对商业竞争。接着分析了徽商商业教育的主要内容主要是文化知识的传授；商业伦理道德的传递；商业技能的传承；综合素质的培养。最后指出徽商商业教育的方式和方法，一是获取直接经验的实际历练；一是汲取间接经验的商书学习。柴国珍则专论了山西商人的商

[1] 《安徽史学》2006年第3期。

[2] 《浙江学刊》2007年第2期。

[3] 中国知网：http://kns.cnki.net/kns/brief/default_result.aspx。

业教育，他在《明清山西商业教育摭论》^[1]一文中认为，明清时期，山西人把从商看作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因而重视商业教育也就成了明清晋商最主要的选择。在新的道德价值观树立上，在道德伦理教育上，在商业人才选拔和培养上，在商业知识与技能传授上都给予十分的重视，形成了重视商业教育的浓厚氛围，为山西商人驰骋商界五百年培养了大批的商业人才。

上述研究无疑深化了对徽商的认识，尤其对研究徽商的职业教育很有帮助。但前贤的研究由于受到文章篇幅的限制，很多问题也只是点到为止，未作深论。还有一些未能涉及的问题，如徽商职业意识的觉醒、职业教育教材的编写、徽商职业教育的特点和意义等问题，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特别是近十年来，大批新资料陆续问世，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是前贤研究这一问题时所不具备的。

本书正是利用大量的关于徽商的文书资料以及家谱资料，探讨徽商的职业教育的一系列问题。

[1]《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卷第4期（2004年12月）。

目 录

- 第一章 明清商品经济的繁荣**
 - 第一节 区域经济的形成 / 001
 - 第二节 工商城市的增多 / 005
- 第二章 国内商帮的兴起**
 - 第一节 长途贩运日益兴旺 / 012
 - 第二节 地域商帮的崛起 / 031
- 第三章 徽商职业意识的觉醒**
 - 第一节 明中期王阳明学说在徽州的传播 / 068
 - 第二节 士农工贾，勇往为先 / 072
 - 第三节 贾何负于农 / 075
 - 第四节 贾何负于儒 / 078
- 第四章 职业教材的编写**
 - 第一节 一般经商知识的教材 / 085
 - 第二节 特殊行业的职业教材 / 119
- 第五章 职业技能的传授**
 - 第一节 怎样做学徒 / 151
 - 第二节 怎样做行商 / 165
 - 第三节 怎样做坐贾 / 174

第六章 职业道德的培养

第一节 立品做人的教育 / 186

第二节 艰苦创业的教育 / 193

第三节 遵守法律的教育 / 204

第四节 诚信观的教育 / 212

第五节 义利观的教育 / 217

第七章 徽商职业教育的特点与意义

第一节 徽商职业教育的特点和局限 / 225

第二节 徽商职业教育的意义 / 230

附 录 《商贾便览》 / 234

第一章 明清商品经济的繁荣

第一节 区域经济的形成

如果说商人是长袖善舞的演员的话，那么要演出威武雄壮或激动人心的活剧，必须要有一个广阔的舞台，而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区域经济的形成正是为商人提供了这个舞台。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推行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经济的政策，使得社会经济在元末面临崩溃的情况下，迅速得到恢复。经过明初七八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到了明中叶，商品经济出现了新局面。

首先是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前所未有的区域性农业经济出现了。粮食生产同棉花、蚕桑、甘蔗、染料、烟草等经济作物生产分离的趋势日益加快。如湖广地区，向以“田多而地少”著称，于是河南、江南和江西等地的居民纷纷移居于此。人口的大量涌入，加速了农田的开发，使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加上山区的开发、水利的兴修，粮食生产迅速发展，以致长江下游各地的粮食供应竟依赖于湖广。从明代天顺（1457~1464年）年间开始流传的“湖广熟，天下足”谚语来看，湖广

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区。经济素来发达的江南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一带，这时已逐渐发展成蚕桑、棉花等经济作物区。尤其是湖州地区宜于植桑，故时人谓：“蚕桑之利莫甚于湖，大约良地一亩，可得叶八十个（每二十斤为一个），计其一岁垦锄壅培之费，大约不过二两，其利倍之。”^[1]养蚕之家，大多自栽桑树，从而很多农田变成桑田。其他如苏州府、松江府又是主要产棉区，大量的农田改种棉花。河南、山东棉花的种植也很普通。福建、广东居民则大多以种植荔枝、龙眼为业。区域性农业经济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大规模的区域贸易。

其次是手工业专业地区逐渐形成。随着手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手工业品的产量和质量也不断提高。当从事手工业的利润大于务农利润时，就不断吸引着人们从农业转为手工业，从而逐渐形成各有特色的手工业专业区。如松江就成为闻名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府属太仓县“棉花八月熟，九月中，南方贩客至，城中男子多轧花生业”^[2]。昆山县“田土高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土人专事纺织”^[3]。松江的棉布产量很高，以致有“衣被天下”的美誉。全国丝织业的中心，在南方则推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府。例如苏州的丝织业就是在明初发展起来的。宋元时，丝织业只集中在郡城，至明初洪熙、宣德（1425~1435年）年间，丝织业扩大到小集镇，很多人都从事丝织业生产。明人张瀚说：“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纴，而三吴为最。”^[4]所谓三吴，一般意义上的三吴是指吴郡、吴兴郡和会稽郡，也就是苏州府及其周边地区。在这里，有的地方甚至家家户户都工于织作，可见这里从事丝织业人数之多、丝织业之发达。山西潞安则是北方丝织

[1] 徐献忠《吴兴掌故录》卷三。

[2] 《太仓州志》卷上。

[3] 归有光《震川集》“论要区赋役判书”。

[4]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业中心，此地所产潞绸驰名天下，这里从事丝织业的则有几千家。江西浮梁景德镇又是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官窑、民窑的工匠们夜以继日地劳动，“杆声动地，火光烛天，被人称为‘四时雷电镇’”^[1]。此外，广东南海县的佛山镇、陕西华州及其所属的柳子镇则是有名的冶铁铸造业中心。这些手工业专业区生产出来的产品无疑都要投向市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商品交换的发展。

第三，区域间的贸易愈益加强。由于区域农业经济的形成以及手工业专业地区的出现，互通有无的区域贸易也就随之发展起来。如北方虽广为植棉，但织布技术较差，必须仰赖南方的棉布，南方虽精于织布但棉花供应不足，又要依靠北方的棉花，“故棉则方舟鬻于南，布则方舟而鬻诸北”^[2]。长江下游一带，由于经济作物增多，粮食作物减少，又必须运采湖广之米。关中遇到歉收，也仰赖湖广、江西，这样南北东西的物资交流便日益频繁，以致形成“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3]的商品大流通局面。这一切都给商人的贸迁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第四，东南城镇商品经济获得较大发展。东南城镇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度和广度，表现在城市日趋繁荣和东南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关于城市的繁荣我们将在下节专门论述，这里重点介绍勃然兴起的东南市镇。当时苏州府、松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五府是长三角一带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而新兴镇市最多，发展最快。如苏州府吴江县的盛泽镇，明初只是一个仅有五六十户人家的村邑，到成化间，“居民附集，商

[1] 王世懋《二酉委谭摘录》。

[2] 王象晋《木棉谱序》，见清农工商部撰《棉业图说》第四册，宣统三年（1911年）版。

[3] 李鼎《李长卿集》卷十九，万历四十年刻本。

贾渐通，后遂成镇”。黎里镇到了成化年间竟成了“百货并集，无异城市”的“巨镇”。湖州府的乌青镇，成化、弘治间由于连年丰收，获得迅速发展，“负贩之广，耕桑之勤，又日盛一日”。菱湖镇这时也是“第宅云连，蔚为冠盖”，它与南浔镇以及嘉兴府的石门镇，都是产丝的著名市镇。当时，在长三角一带，兴起了一百多个市镇。

当然，我们也不可忽视，明代赋役结构的变化也成了商人勃兴的加速剂。明中叶以来，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封建国家以本色粮为主的赋役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正朝着赋役货币化的方向发展。从正統年間（1436~1449年）开始，“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万余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其后概行于天下”。^[1]这一变化，成为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赋税折银缴纳，迫使生产者必须更多地出售产品，换回货币以交纳赋税。这样一来，大批产品投放市场，在当地自然难以消化，势必要寻求更广阔的市场，从而大大促进了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尤其是纳银的农民往往为时限所迫，对自己的产品不能待价而沽，有时只能降价抛售，人为地造成商品的价格与价值的背离，这又给商人牟取厚利提供了可乘之机。

总之，市场的活跃和扩大，经商的有利可图，加速了商人的勃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徽商及时地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在困境中奋起，因时乘势，得到较大的发展。他们大多已不满足于将徽州土产运出去，再将外地商品运回来的简单的贸易，而是投身到当时的商品经济大潮中，放眼全国，参加更大范围内的区域贸易。他们利用毗邻东南经济区的地势之利，首先闯入东南城镇，凭借着血缘和地缘的关系，结伙从

[1]《明史》卷七十八《食货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96页。

商，逐渐成为称雄商界的大商帮。

第二节 工商城市的增多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的城市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国历史上城市的功能，明清以前一直是以政治功能、军事功能为主，明中叶后很多大的城市，除了仍保持它的政治和军事功能外，作为商品贸易中心的经济功能正在逐渐凸显并越来越强化，甚至出现了不少纯粹的工商业城市。

明清时期的大城市当然首推京师（北京）和南京。

京师（北京）是明清两朝的都城。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最初是将都城定在应天府即今天的南京，直到永乐皇帝朱棣登基后，为了更好地防御蒙古残余势力的入侵，便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将都城迁于此，始称京师。无疑这里自然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虽然经过元末战争，京师人口一度大减，但由于永乐皇帝实行移民实京师的措施，加上一些经济政策，这里的人口又逐渐增多。随着明代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了明中期，京师人口大增，史载：成化五年（1469年）时，“京师居民，不下数十百万”，^[1]他们都来自四面八方，而且都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农业生产，因此，他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原料的部分或全部，不得不依靠市场获取。城内开设了很多店铺，如油坊、磨坊、糖坊、机坊、茶坊、饮食、木器、剪裁、绣作、酒店等，以满足城内居民的需要。除了正规店铺外，北京还有一些定期的集市。其中比较有名的是灯市、城隍庙市和内市。灯市每月初五、初十与二十举行，庙市因设于城西都城隍庙

[1]《明经世文编》卷七十五，“遏盐议”。